

1911-1960



影像

中國

實業與金融

鄉村・城市

中央通訊社、商周出版編輯部——合作出版

何飛鵬——總策畫

黃克武——總論

劉素芬——導讀

1911-1960

影像

中國

實業與金融

鄉村・城市

中央通訊社、商周出版編輯部——合作出版

何飛鵬——總策畫

黃克武——總論

劉素芬——導讀

影像 中國 1911-1960

映像紀實 21
實業與金融
鄉村・城市

- 照片資料提供——中央通訊社
編輯企劃——商周出版編輯部、中央通訊社
總策畫——何飛鵬
總論——黃克武
導讀——劉素芬
顧問——林桶法、林蘭芳、邵銘煌、唐啟華、黃克武、劉素芬、劉維開、歐素瑛（依姓氏筆畫序）
書法題字——董陽孜
主編——黃靖卉、林淑華、范雅鈞、陳錦昌
責任編輯——林淑華
版權——翁靜如
行銷業務——張娛茜、黃崇華
總編輯——黃靖卉
總經理——彭之琬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出版——商周出版
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Blog：http://bwp25007008.pixnet.net/blog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00；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套書整體設計——徐璽
內頁編排——徐璽設計工作室
印刷——卡樂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6689005 傳真：(02) 26689790
2014 年 5 月 6 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套書定價 9800 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272-554-2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影像・中國：1911-1960：實業與金融 鄉村・城市
／中央通訊社作，-- 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05
面；公分。--（映像紀實；21）
ISBN 978-986-272-554-2（精裝）

1. 中華民國史 2. 新聞攝影 3. 照片集

總策畫 序

讓圖片說話， 還原歷史真相

一九八六年，我為了籌辦臺灣經濟影像回顧展，需要一些臺灣的老照片，而到了中央社的照片資料庫，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央社的圖片庫。

當我踏進中央社的大門之後，我看到了中央社豐富的照片檔案，除了有四九年遷臺之後，在臺灣早期的照片之外，我更發覺從中央社成立以來，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國拍照留存的各種歷史檔案照片：從歷史新聞事件、人物照片到八年抗戰隨軍拍攝的照片，當然還兼及整個社會經濟、民生的照片。

我一方面震懾於圖片庫的豐富、多元及珍貴，一方面就埋下了終有一天，我要將這些珍貴照片公諸於世的心願，不要讓這記錄了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寶貴影像，一直埋藏在檔案櫃之中。

一九九六年，我們創立了城邦出版公司，從那時起，我離這個讓中央社寶貴的照片問世的願望就近了一些。可是這十幾年來，我雖曾嘗試接觸中央社，試圖出版這些照片，但一直未能如願。

一直到二〇一二年，城邦已成長成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我們有更大的實力實現此一願望，我再度嘗試敲開中央社的大門。

我們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出版計畫，準備出版一套《影像·中國》的套書，以涵蓋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播遷來臺至六〇年以前戰後臺灣的歷史，完全用影像說故事，以最真實的照片描述這一段歷史，而主角就是中央社典藏的照片檔案。

經過幾次的接觸之後，獲得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的初步認可，我們有機會與中央社經營團隊坐下來仔細商議出版的可能，經過不斷的討論之後，我們終能獲得出版共識，而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

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才是真正困難的開始。面對中央社典藏超過百萬張的照片庫，我們要如何去挑出有出版價值的圖片，而這些圖片又要用何種出版架構呈現，都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還談不上對這些歷史悠久、可能已經變質的老照片必須要仔細修片才能使用的問題。

經過不斷的反覆探索之後，我們最終決定全套八冊的出版架構，四九年之前六冊，四九年遷臺之後兩冊，另加兩冊介紹性的主題別冊，這就是此一套書最終呈現的樣貌。

我之所以心心念念此一套書的出版，除了要讓中央社這些媒體記者前輩的心血能為世人所見，以彰顯他們記錄歷史洪流的巨變之功外，我更想藉此一套書來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相。

自從政府遷臺以來，近代中國歷史變成海峽兩岸各說各話的局面，臺灣與大陸各有一套論述，也都各自採取對自己能自圓其說的論點，彼此並沒有明確的交集。

而中央社的攝影記者們，在歷史變動的第一現場記載了整個巨變的過程，用一張張的照片記錄了每一個變動的瞬間，這應是最寶貴、最接近事實的見證。因此，如果能把這些照片，用歷史的線性記錄出版成冊，絕對可以還原歷史的真相。

除了見證那一段歷史之外，在此次出版的套書中，也有許多民國初年人文、社會、經濟、文化的圖片，可以讓現代人了解當時的生活樣貌——文化、經濟、金融、實業，以及體育等各種面向，這是最直接且完整的記錄。

除了用照片做為全書的主要架構外，針對每一冊的主題，我們也邀請當代的歷史專家，分別寫一篇導讀，以便讀者能對全書的主題，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理解，以增加此一套書的權威性及完整性。

回溯這一套《影像·中國》套書的出版，從起心動念到真正付諸執行、編輯、策畫、出版，凡廿餘年，對我個人而言，一圓了幾十年的心願。而對所有的讀者而言，也有機會把儲存在歷史檔案中的珍貴歷史圖片，讓它重新問世，讓中央社歷代前輩記者先進們的心血，能用更方便、友善的方式與讀者見面，這應是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

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豐 收

中央社非常獨特，民國 13 年誕生，到今年已 90 歲了。它不僅僅是中華民國的國家通訊社，肩負國內外傳播的重任，與國家發展同步前進；同時，它在大陸發跡，茁壯於臺灣，面向全球五大洲，更是唯一擁有如此寶貴經驗的新聞媒體。

自成立以來，中央社在各個領域的採訪報導都有傑出的表現，所累積的資料非常多。其中最珍貴的，就是擁有 158 萬張新聞照片：民國 13 年至 39 年大陸時期約 10 萬張，民國 39 年迄今臺灣時期約 148 萬張，現仍陸續增加中。

新聞工作者都知道，每一張新聞照片，報導了每一則新聞。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新聞照片轉換為檔案後，這張照片就敘述了一段歷史。而一張又一張的照片串連起來，加上簡要的文字說明，就成為各界解讀過往的絕佳視窗。

這 158 萬張新聞照片，可說是中華民國從民國 13 年以來的歷史縮影，有官紳名流的樣貌，有市井小民的百態，也有城鄉聚落、經濟建設等情形，不一而足。經過多年的努力，這些照片全部數位化，典藏在中央社的影像空間內。

國內外訪賓參觀中央社，看到影像空間裡的照片，無不讚嘆其內容之豐富，以及難以估算的價值。正因為如此，不光是新聞媒體同業，連國內外學術單位、研究機構也對中央社的照片充滿了興趣，紛紛前來取材鑽研。

記得一位歷史學者參訪中央社後，對民國 39 年之前大陸時期的照片看了又看，愛不釋手，並對這些照片都已數位化，更是豎起了大拇指。他強調，中央社的照片，既是新聞，也是歷史，能保存如此的好，真是不容易。

的確，早期的新聞照片是由藥水沖洗出底片，再由底片沖洗出照片，這些照片若存放不當，很容易退色、沾黏、刮傷等，就無法使用。因此，中央社花了很多的時間、費用及人力，將這些照片掃描、建檔、儲存，重現當年風華。

近年來，中央社積極規劃典藏照片的運用，除了在重大歷史事件上，或特殊紀念日時，接受政府部門、民間業者的委託辦理相關展覽之外，也尋求自行或合作出版書刊的機會，期能透過照片的影像來呈現歷史的原貌。

當城邦出版集團前來洽談合作出版事宜時，聆聽何飛鵬執行長宏觀的構想、編輯人員仔細的規劃後，中央社很認同。雙方往來磋商數回後，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就決定合作，以典藏照片為本出版《影像·中國》套書。

城邦不僅是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擁有各類型書刊的出版經驗，同時出版品也行銷海內外，了解全球各個地方的發行通路，是華人出版界的翹楚。更重要的是，何執行長對歷史關注的情懷，為理想而奮進的努力，令人折服。

畢竟，中華民國的發展軌跡，特別是 1949 年之前在大陸的階段，中央社的新聞照片都可以為證，絕不容青史盡成灰。而將這些照片集結成書，以影像來讓各界了解史實，也正是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一致的願望。

於是，將典藏的照片交由城邦出版這套影像書籍，中央社非常放心，全力配合。而這也是新聞媒體與出版業者的跨業合作，雙方各展所長，互惠雙贏的具體表現。這次合作，對中央社、對城邦出版集團而言，都是豐收！

中央社社長



總論

鏡頭下凝結的 歷史瞬間

本套書由中央通訊社記者親臨歷史現場所拍攝的照片編輯而成，這些照片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編輯團隊從數百萬張影像資料之中精選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依照主題分為八個單元，來呈現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諸多面向，同時為了使讀者更容易掌握其內容，出版社又委請專家學者撰寫導讀，並對每一幅照片加以說明。《影像·中國》一至六冊為民國 38 年（1949）之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軍事與外交等主題，七至八冊則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政經、教育與外交等方面的發展。這一套書讓我們得以跟隨著中央通訊社記者的足跡，親臨歷史現場、還原歷史真相。

書中影像所捕捉到的歷史，含括了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這一時期的中國在共和革命、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入侵與國共內戰的交織下動盪不安。此時期的中國充斥著動亂、血腥與暴力，照片之中所呈現的辛亥革命、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尤其可以讓人深刻感受因人禍而導致的災難。但在暴力的背後，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與尋常百姓之日常生活。在辛亥革命之中，人們企求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在軍閥混亂之中，人們希冀國家統一，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終於帶來了國家的統一與建設，如新生活運動即象徵著對於現代國家、國民之追尋；另一方面，共產運動的支持者則秉持著平等、正義、破除階級剝削的社會理想。

上述希望的追求又種下了毀滅的種子。1937-1945 年中國面臨了日本的侵略。在面對外患的同時，中國內部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而分裂為二，一個陣營為蔣中正與他所領導的國民黨，以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號召；另一個陣營則是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此一分歧在抗戰期間逐漸顯著，而愈益加深，日本的入侵又給予中共發展製造了很好的機會（難怪毛澤東要感謝日本人）。國共對峙的情勢也因帝國主義國家的涉入而變得更為複雜，國民黨的一方企圖依賴美國，共產黨的一方則倚賴蘇聯（共產國際）。

以上大致是 1945-1949 年國共內戰出現的重要背景。內戰期間，蔣中正所領導之國軍本來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然在戰略上、外交上卻不如共軍來得靈活，加上國內知識界與國際上要求國共和談的聲浪，蔣中正反而受到諸多牽制。1949 年在內戰之中國軍節節敗退、部分將領倒戈投共，終至丟掉了整個中國大陸。此後政府遷臺，兩岸分治。遷臺初期，中華民國政府痛定思痛，逐漸站穩腳跟、重起爐灶。

這半個世紀之間的歷史與今日海峽兩岸的處境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有許多深具歷史意涵的一些議題頗耐人尋味。例如辛亥革命之後為何無法建立平穩的共和政府，中國反而陷入混亂？中國與日本兩國號稱「同文同種」，為何所有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包括汪精衛的努力），必須走向兵戎相見而導致生靈塗炭？抗戰期間國民黨、共產黨如何面對「安內」、「攘外」等議題，其分合的原因何在？影響國共內戰之結果的關鍵因素為何？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清楚的答案。

本套書的影像資料可能無法完全解答上述的歷史議題。其中一個原因是書中照片均來自中央通訊社的單一視角。該社在 1924 年成立以來就與中國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開始時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通訊社」，負責發布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重要文告和各種官方消息。其後經過多次改組，並擴充組織，陸續在各地設立分社、派駐通訊員、建立通訊網絡等。1934 年，中央社耗費巨資到國外購買新式機器，增強發報能力，開始與路透社、哈瓦斯社、合眾國際社等國外通訊社簽訂交換新聞協議，從而控制了新聞來源渠道，並得到無線電發布新聞的專利權。中央通訊社因而在中國新聞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成為國民政府的宣傳機構。

這樣的地位使該社一方面累積了大量的新聞照片，另一方面他所「製造」出來的照片都是從中央政府立場出發而展示出的場景。此一情況在戰爭相關的照片尤其明顯，無論是對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所呈現的都是「我方」觀點。這是在閱讀本套書時需要注意的。同時，如果讀者能夠配合其他類似照片集，例如日軍隨軍記者和外籍新聞記者所拍攝的照片，乃至中共方面的影像材料，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多元的歷史視野。不過即使如此，本套書所展現的影像仍是非常豐富與罕見的，這些凝結的歷史瞬間顯示出中國人的堅忍與苦難，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要篇章。經由影像所述說的各種各樣感人故事，在我們掩卷之後仍將縈繞心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黃克武

看見一個 追求現代化的新中國

帝制時期的傳統中國，以農立國，朝代的興衰更替與廣大的農民和農業收成好壞密切相關。1870 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新式交通運輸工具和機器製造工業，也出現了新興的現代產業部門。從晚清到民國，及至對日抗戰爆發之前的 1936 年，包括鐵路、輪船航運、製造業及礦業等，均呈現長期的成長。然而此一快速成長的現代產業部門，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5%，傳統產業部門仍然占有經濟的主體地位。例如工業、礦業、交通運輸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10%，其中手工業等傳統的生產方式仍占三分之二。雖然傳統交通運輸不敵輪船、鐵路的低廉便捷，而造成挑夫、水手等從業人員大量失業，但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手工業等傳統產業部門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長期之間出現絕對數量的成長，只是成長速度相對遠不及現代產業部門。近代中國因此呈現傳統與現代並存的雙元經濟，在歷經 60 年的發展之後，廣大農村的財富分配日益不均，社會人心普遍不滿。

帝制晚期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在於龐大的人口壓力，導致可耕地嚴重不足，佃租高漲；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造成每人平均生產力低落。農村因為高利貸盛行、田賦負擔不均、吏治敗壞，農民生活困苦。及至 1930 年代的中國，由於民國以來內部的長期動亂不安，與國外經濟因素導致的劇烈白銀緊縮，農村經濟瀕臨破產，農業危機加深。國民政府迫於內憂外患和地主的反對，既無心也無力解決農業問題。傳統農業的衰落，一方面使國民政府無法如近代日本，向農業部門汲取田賦，做為國家現代化的原始資本；另一方面，農村購買力的低落，也使國內產業失去廣大的市場，無法迅速發展。

晚清以來，中國為籌措戰費和負擔甲午戰敗後的對日賠款、庚子賠款，大量舉借外債，國庫空虛，政府經營航運、電報、紡織、銀行等新式產業，多著眼於財政收益。民間業者必須面對低關稅之下的外國產品競爭、資本和技術人才的短缺、傳統的賤商觀念和有利盡分的商業習慣、家族主義的盛行等因素，不利於資本累積和現代產業的經營。民國成立以後，國內投資環境較為改善，民間投資計有兩次大幅成長：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外國產品無法

進口，國內產業擴張，1912至1920年工業年平均成長率高達13.4%。二是1928年以後關稅自主，政府大幅提高海關進口稅率，藉以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具有保護本國產業的作用。由於社會長期動亂不安，新式產業多集中沿海的通商口岸和租界，提供了必要的交通和法治條件。外國人引進現代化所必需的資金和技術，包括財政管理、交通運輸、公用事業、製造業、礦業等。以製造業為例，1933年外人投資占有35%，其中以交通、電力等公用事業最多，外資比例超過50%。各國之中又以日本對東北的投資建設最為積極。根據學者估計，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年平均經濟成長率，1912至1949年為5.6%，其中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1928至1936年為8.4%；如果不包括東北，1931至1936年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為6.7%，日本統治下的東北為9.3%，後者遠高於前者。由此可見外資和東北對於近代中國經濟的重要地位。

以上說明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由於西方生產技術的引進，出現了失衡的雙元經濟。一是產業部門的失衡：一個龐大而成長遲緩的傳統產業部門，相對於一個微小而成長迅速的現代產業部門，兩者並存；民間投資和外人投資的現代產業部門，多以消費性輕工業為主，缺乏國家現代化所必需的基礎建設及重工業。二是區域發展的失衡：既有發展迅速的現代化、城市化沿海地區，與廣大而傳統保守的內地農村並存；也有日本統治下的關外東北，和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關內中國本部並存。中國的區域發展，因此出現東與西、南與北的巨大差距。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秉持孫中山先生主張國際共同開發中國資源的理念，向外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具體成果有三：一是1929年美國甘末爾顧問團訪華，長期協助中國解決財政貨幣問題，終於促成1935年的法幣改革。二是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進行多方面的合作。三是成立建設委員會和中國建設銀公司，利用英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和國際財團等外人投資，從事鐵路、電力等建設。面對1929年之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1931年的長江大水災和日本占領東北等惡劣環境，中國採取務實的發展策略，著重統一、剿共、

抗日。一方面政府為排除國內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疑慮，另一方面國際聯盟和美國為避免與日本衝突，國際合作多強調技術性、非政治性。例如教育文化和衛生防疫事業；修築水利和交通運輸建設，包括公路、鐵路、航空事業等。迅速便捷的交通運輸，有助於國家統一，但多從戰略著眼，缺乏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

中央政府的建設策略採取重點實驗方式，以首都南京為中心，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包括聯絡南京、上海、杭州三點的鐵路網，擴建華中七省的公路等。至於地方省政府也積極從事工礦、交通建設，其中以廣東和山西成果較著。其餘各省政府或與全國經濟委員會、國際聯盟、華洋義賑會合作，多徵用民工、兵工，從事水利和公路建設，以進行賑災、墾荒、安置軍隊、消弭內戰等。包括陝西省的涇惠渠、洛惠渠、渭惠渠、西蘭公路；甘肅省的民生渠、甘新公路、甘青公路；寧夏省的雲亭渠、雲南省的滇緬公路、廣西省的湘桂鐵路等。其中通往越南、緬甸、印度、蘇聯的邊境公路，在抗戰時期成為聯外的國際通路，維繫了後方的軍事、經濟命脈。在交通要道上發展起來的內地城市，如漢口、長沙、桂林、昆明、西安、蘭州等，隨著戰爭局勢的轉移而榮枯，也反應出戰火下人民的流離苦難。

1928年國民政府也開始著手改革稅制和金融貨幣，包括提高關稅進口稅率、廢除釐金雜稅、開徵所得稅等，以解決財政困難，同時達到提倡國貨、保護本國產業的目的。其中所得稅由於課徵不易，成效不及統稅，後者兼具貨物稅和消費稅的性質。更重要的是法幣改革。1929至1931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遠不及1934年的美國購銀法案來得深遠。1932至1934年世界銀價驟跌暴漲，造成中國內地白銀外流，通貨緊縮使農村經濟破產。1934年10月中國放棄銀本位，並於1935年11月改採金匯兌本位的法幣制度，1936年發行中國造幣廠的新式銀輔幣等。法幣改革的成功，得力於政府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收歸國有，提供豐厚的實力；美國收購中國白銀，提供必要的發行準備；中國建設銀公司和英、法國國際銀團合作，投資鐵路建設，吸引大量外資流入等。中國經濟建設因此出現前所未見的

榮景。對於制度因素稀缺的中國而言，中外技術合作和法幣改革也說明引進國際經濟體制的重要性。

國民政府的實業建設，根據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為原則，一方面扶植民營輕工業，一方面建立國營重工業。然而這種公私混合的經濟體制應如何運作，隨著 1930 年代國內外局勢的轉移而有所不同。實業部首先制定各種法規制度，以獎勵工業、保護發明專利、統一度量衡和工業標準；提倡國貨運動，舉辦國貨展覽會；政商人士相繼訪問東南亞，開拓海外南洋市場，並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在合作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號召之下，實業部倡議成立全國性的中國國貨聯營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廠，對茶葉和桐油進行貿易統制；設立農本局，推動農村合作社的成立，特別是信用合作社，以融通農村資金。隨著日本威脅的加強，以德國和蘇聯的計畫經濟模式為本，1935 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積極推動國防重工業的建設，但截至抗戰之前，鮮少具體成效。

1937 年對日抗戰爆發後，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者在政府協助之下，輾轉遷入西南各省，在後方形成多個工業區。其中以重慶近郊的李家沱工業區最具代表性，由政府和民間業者合力建設開發，共組中國給水公司。隨著抗戰時間的拉長，1940 年的西南旱災與對外交通斷絕，導致物價飛漲，政府為平抑物價，加強統制經濟，與民間業者由合作轉為對立。民營企業因受限於物價上漲、交通困難、原料缺乏，多陷入營業困境，乃向國家銀行合組的四聯總處尋求救濟，更加深政府的監督與控制，例如對中國興業公司的增資參股。唯獨資源委員會經營的國營重工業，賴有鎢、銻、錫等特種礦產的易貨外匯挹注，得以大幅成長。包括收購湖北漢陽鋼鐵廠和六河溝鐵廠的設備；併購遷川的民營企業，改組成資渝鋼鐵廠、資和鋼鐵廠；投資控制雲南省政府建立的箇舊錫礦、明良煤礦；與外資合作開發四川天府煤礦；開辦甘肅油礦局等。

抗戰勝利之後，資源委員會因為接收日本在東北、臺灣及淪陷區的生產事業，更形壯大。然而資源委員會長期投資國營重工業，卻無補於戰時的民生經濟。西南後方仍以傳統經濟為主，包括農、礦產品和各種手工業生產，例如四川各地的手工紡織業、土法造紙、自貢市的井鹽等。由於政府依靠發行法幣挹注財政，大量的貨幣追逐少量的產品，導致糧價上漲，日用必需品供應不足，各種平價措施均告失敗。抗戰結束之後，繼之以國共內戰，財政枯竭，通貨膨脹越發無法控制。國民黨政府遂於 1948 年進行第二次貨幣改革，發行金圓券，隨即以失敗告終，從此喪失在大陸的政權。但抗戰時期中國工業區位的重新布局 and 國營重工業的擴張，均影響 1949 年之後中國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社的照片具體傳達了國民政府提出進步的「發展」政策，積極鼓吹經濟建設，以爭取國內外對於中國合法政權的認同。例如中國工程師學會和資源委員會的新式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現代化有許多貢獻，包括粵漢鐵路、錢塘江鐵橋、電力事業等。至於國際合作，包括建設農村、賑災、防疫、衛生、水利、公路、鐵路、輪船、航空事業，並參與國際勞工運動、禁煙運動、海事會議等，以正面回應國際社會，也滿足國人要求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心理。國際聯盟認為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政府，是遠東長久和平的基礎，因此積極拉攏中國，提供教育文化和技術合作等援助；美國則認為購銀法案使中國經濟深受其害，若因此造成財政崩潰瓦解，將使日本坐收漁利，因此收購中國白銀，協助推動法幣改革，從而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流入，並提供各國資本財廣大的市場。由於這些肯定的表現，中國成為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世界五強之一。

1934 年以後中央社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中國影像，一方面呈現國際合作之下，中國繁榮、進步、現代化的一面，卻獨缺日本的參與，可能刺激日本，或許成為導致中日戰爭提早爆發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為了統一、抗日，過於強調交通運輸、國營事業及國防重工業，引發民營工商業者不滿，且無力進行廣大的農村改革和農業建設，激化共產主義的發

展。美籍財政顧問楊格認為美國的購銀法案促成中國的法幣改革，既提供抗日必需的財政手段，也導致戰後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從而改寫二次大戰和戰後的世界歷史。1950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在美援的協助之下，推動台灣經濟發展，重視農村建設、民營工業、外匯改革、財政收支平衡等，可謂記取歷史教訓。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素芬

1933 年



民國 20 年代的孔祥熙。

孔祥熙（1880 — 1967），山西省太谷縣人氏，祖籍山東曲阜，美國歐柏林大學畢業，耶魯大學礦物學碩士。民初獲得英國殼牌石油在山西的獨家代理權，因此經商致富。在東京為中華革命黨籌集經費期間，結識時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宋靄齡，不久兩人在日本結婚。民國 15 年，孔祥熙擔任廣州國民政府廣東省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務；兩年後擔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長；民國 19 年改任實業部長。民國 20 年，隨連襟蔣中正去職，短暫遊歐返國後，接任中央銀行總裁，不久再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長，此後持續擔任財政部長一職，直至民國 33 年。孔祥熙主掌國民政府財政，褒貶不一，正面貢獻如改革稅收、加強中央財政控制權、改組銀行體系、整理政府債務；改革幣制，以法幣取代銀本位，制止白銀外流。負面評價則直指孔氏貪財，中飽私囊，藉職位權勢大發國難財。



民國 26 年 4 月 28 日，為參加英皇加冕典禮，中國特使孔祥熙（正中未戴帽者）、副使陳紹寬（正中右側戴白色海軍帽者）及全體團員，一行三十餘人搭郵輪維多利亞號啟程，中央要員及各界人士前往歡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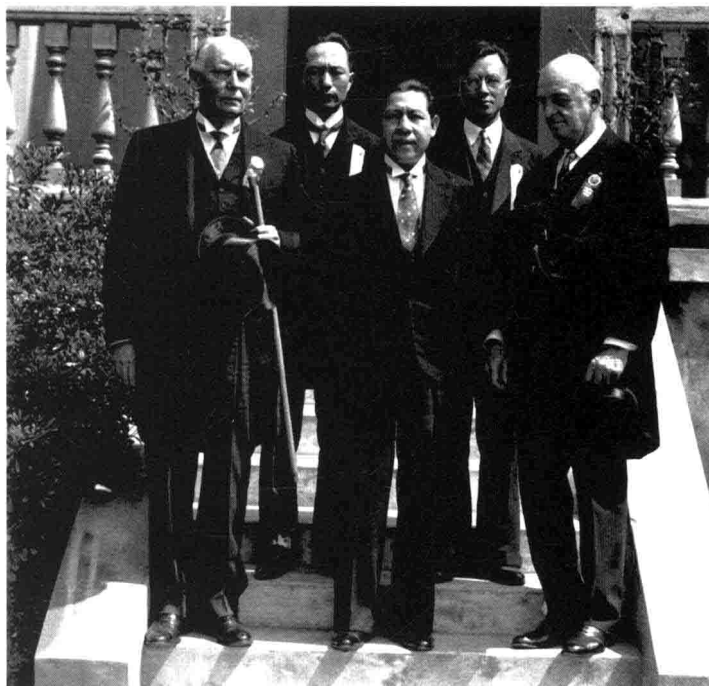


民國30年代的宋子文。

上——宋子文（1894－1971），廣東文昌人氏。出生於上海，父宋嘉澍是孫中山忠實支持者與金援者。大姊宋靄齡、大姊夫孔祥熙；二姊宋慶齡、二姊夫孫中山；妹妹宋美齡、妹婿蔣中正，可謂一門顯貴。宋子文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民國12年，負責籌備廣州中央銀行並擔任行長，兩年後兼任財政部長。民國17年新中央銀行在上海開業，宋子文擔任總裁。之後歷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職。宋子文主掌國民政府財政、外交期間，如同其大姊夫孔祥熙，輿論褒貶不一，時人並稱「孔宋家族」。

中——陳公博（1892－1946），福建上杭人氏，就讀北大哲學系期間受五四新思潮影響，傾心社會主義思想，曾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廣州代表。不久因故退出共黨，旋赴美攻讀哥倫比亞經濟系碩士。返國後受延攬入國民黨，受黨內左派器重，從此長期追隨汪精衛為重要副手。民國21年1月，孫科接任行政院長，陳公博接替孔祥熙任實業部長。同月，孫科內閣因一二八事變總辭，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陳公博續任實業部長。民國24年因九一八事變，汪精衛內閣總辭，蔣中正接任行政院長，改任吳鼎昌為實業部長。

下——吳鼎昌（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氏，民國初期北洋政府金融界要角。民國15年，出資與張季鸞、胡政之等人接辦《大公報》；民國24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請辭《大公報》社長。民國26年至33年，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提出開發貴州、支援大西南的口號，引入官僚資本、建立各種地方官僚資本工商業，成功開發貴州生產力與經濟發展。



美國羅安傑商會組成遠東經濟考察團，民國24年4月24日拜訪實業部長陳公博（前排中）留影。



民國20年代的吳鼎昌。